科学导报
2025年9月15日 星期一
责编:李 军
投稿:kxdbnews@163.com

国际视野与大国担当

——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看中国的世界影响

■ 张 静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蓝图,受到全球的高度关注。此次会议不仅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世界同样意义非凡。此次会议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的信号,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向,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正能量,也成为外界准确认识中国、理解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深化改革开放领航,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动态备受世界瞩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犹如一座灯塔,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新的方向。此次会议强调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并作出一系列部署,为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积极且关键的推动作用。

作为全球经济规模排名第二的国家,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必然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显著的影响。英国广播公司(BBC)称:“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聚焦经济改革,往往对中国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三中全会往往承载着制定出台重大经济改革政策的预期。”在当前一些国家采取更加保守和封闭的对外政策的背景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向国际社会明确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前进。通过实施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一个开放型的世界经济体系,并旨在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的利益和福祉。

近年来,在全球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的贡献比例始终维持在约三分之一。中国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将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增加进口,为其他国家的商品和服务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倡导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全球经济稳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此次会议提出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促进了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加强了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对稳定全球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不难发现,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坚定信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展现出中国坚定不移深化开放的决心,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的持续前行,将继续为全球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书写新的篇章,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稳定力量和积极驱动因素,为构建更加紧密、互利共赢的全球经济格局贡献独特而卓越的力量。

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在稳步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已经向世界证明了实现现代化并非只有一条路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整个世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站在人类发展新的十字路口,面对世界百年变局的风云际会,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坚定支持者,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世界带来广阔的新机遇。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现代化的另一种独特的视角,这不仅为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而且为全人类在寻求更优越的社会制度方面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有力鼓舞和启发了广大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选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擘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和路径。这对于那些渴望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可以从中国的改革经验中汲取有益的元素,结合自身国情制定适合本国的发展战略。正如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所指出的,“观察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持续推进,以及我们西方可以从中学到什么,都将非常有启发”。

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驱动中国可持续发展,为全球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强调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党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新形势和新需求制定的重要战略布局,为新时代下推进美丽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当前,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面临治理效能不足的显著挑战。实现这一目标亟需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并采取更加积极有力的措施。中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始终不遗余力地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用实际行动交出生态文明建设的优秀答卷。中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中成效显著,其新增绿化面积约占世界总量的25%,森林覆盖率增速位居全球首位。同时,我国在土地退化防治方面实现零增长突破,不仅提前达成2020年碳排放控制指标,还将自然保护区覆盖率提升至17%的预定标准……正是基于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担当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深思熟虑,党领导人民持续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紧抓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战略机遇期,积极培育和发展绿色低碳技术及产业,为全球的低碳化转型贡献力量。中国在推动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共同应对全球环境挑战。在促进本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中国也为国际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既分享了先进的治理理念,又为发展中国家推进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范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合作,推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在“一带一路”合作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沿线各国正逐步分享中国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领域创造的积极成果。展望未来,中国依然会坚定不移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世界各国一同携手推动国际生态环境治理合作,携手打造可持续发展之路,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协力建设一个生态良好、经济发达、环境优美的地球家园。

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新篇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

对外开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通过深化开放推动体制改革进程,充分发挥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借助国际合作的拓展来增强开放水平,构建更为完善的开放型经济体系。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更充分地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来推进现代化进程,有利于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智慧与力量、携手各国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途径。自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积极团结世界各国,实质性地推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包括与众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以及在健康、环境、网络和海洋等多个关键领域,中国也不遗余力地推动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作为新时代我国深化对外开放的关键战略部署,“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多年来成效显著。十余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以高质量的合作赢得了全球超过75%的国家及多个重要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中国倡导的全球发展、安全与文明三大方案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由中国主张发展为全球共识,从理论构想转化为具体行动。这一理念已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从发展到安全、从合作到治理,逐渐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一面旗帜,为世界和平、安全、繁荣和进步的光明未来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可以预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将以坚定的决心和实际行动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繁荣与进步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展现出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既擘画了新时代发展蓝图,又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此次会议再次彰显了中国这艘巨轮正坚定不移地沿着既定的航向稳步前进,它为全球带来的是机遇、信心和共赢。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将继续为全球发展注入不竭的积极动力。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科技、教育、人才三位一体,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

——基于对邓小平科技思想的探究

■ 李蕊霞

邓小平科技思想以“两个关键”为鲜明特色:一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整个现代化的核心关键,二是教育和人才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关键。历经40余年发展,我国实现了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跨越。尽管发展阶段不断跃升,但推进现代化的历史大势始终未变,这一目标仍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核心任务。鉴此,延续邓小平科技思想中科技、人才、教育三位一体的内在逻辑,依然是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任务。

一、实现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关键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构成要素,更是驱动现代化进程的内生动力。作为引领时代变革的革命性力量,科学技术深度重塑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已然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标志。

在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创造性论断,深刻确立了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核心地位。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不仅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更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的关键支撑,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筑牢国家安全防线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如何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一要创新。邓小平同志说,“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就要“有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创造”。“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这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能一直奉行“拿来主义”,毕竟其他国家不会也不愿让我们一直坐享其成。因此,在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我们仍需发挥自身努力,实现创新发展,才能赶超先进,解决“卡脖子”问题。二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立足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是闭关锁国,而是要在积极扩大对外交流的基础上,按照中国自身情况、人民力量来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三要坚持党的领导。科学技术的发展,关键是党的领导、政治上的领导。党在保证正确政治方向、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基础上,还要组织好力量、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实现加强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挥专家作用的双向互动。同时,邓小平同志指出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需要有一支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政治上要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这是“红”的表现。政治“红”是业务“专”的前提。

二、实现现代化,人才是支撑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需要优秀人才资源的支撑。邓小平同志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培养,特别是具备一定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的培养,是一项根本性的任务,需要我们长期大量地做工作。

人才方面,需要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其一是人才的培养。人才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力争培养一批专业素质强、政治觉悟高的知识分子的同时,加强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改善科研人员的物质待遇、创建宽松和谐的科研环境是非常必要的。其二是人才的使用。“怎样把全国科技人员使用起来,并且使用得当”,这是领导班子的问题。领导要知人善用,让有科研能力的人搞科研,让党性好、服务意识强、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各司其职、各尽所能,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1世纪,人才作为国家的第一资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是综合国力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信息资源等,只有在人力资源的驱动下,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多庞大人口基数的国家,如何推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进而构建人才领域的国际竞争优势,对新世纪中国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三、实现现代化,教育是基础

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邓小平同志指出,“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搞好教育,才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和坚强后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和创新突破,必须将教育摆在优先地位。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实现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全员参与。

教育的发展和提高,重在发挥好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作用。其一,学校既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也是进行科学研究和发展科技的重要场所。科学技术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的教育水平,科技成果的多少,也与高校教育息息相关。邓小平同志前瞻性地指出“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实现高等院校和大专院校的相互配合。高等院校作为科研的重要方面军,在承担科研任务的同时,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大专院校作为高等院校的补充,要在培养劳动人才的同时,还要助力、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实现两条腿走路。另一方面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提高受教育率的同时,还要通过严格考试,挑选出最优秀的人,为他们创造条件做好研究工作。其二,教师是育人的园丁。“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教师为民族、为国家、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遂在党内、在社会上要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打破科研工作者高于教育工作者错误思想,不断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其三,学生的培养,事关中国的未来,事关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与否。在学生培养方面,“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培养学生的革命理想和共产主义品德,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造就具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一代新人。同时,学校还要加强风气建设。邓小平同志指出,“讲风气,无非是党风、军风、民风、学风,最重要的是党风。好的党风也要体现在教育中,才能培养出好的学风。”党风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将党风融入学生的学风建设中,才能增长学生的知识和志气,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才能培养真正的科研人才。

邓小平科技思想是对时代发展趋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刻凝练,不仅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学说的重大理论突破,更为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引,彰显出鲜明的前瞻性、系统性、发展性和时代性特质。时至今日,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时代要求下,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愈发关键。因此,深挖邓小平科技思想的丰富内涵,充分发挥其时代价值,对于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罪魁祸首:制造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惨案之日军

■ 左小强

近年来,史料的扩充不言而喻。在抗日战争史领域,日本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藏的史料使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与此同时,国内有关日军轰炸中方的史料亦层出不穷。由此,利用日方史料,结合其他史料,研究或许会更上一层楼。

相持阶段,日军实行战略轰炸,重点轰炸重庆,制造一系列惨案,成为罪魁祸首。其中,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军连续轰炸重庆,其结果惨绝人寰,其原因恐怕不能轻虑重事。

一、日军的转变:战略轰炸的兴起

1938年9月6日,日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向“大本营”提交了《关于武汉、广州两战役后处理的形势判断》,其中就已提出除以空军进行作战外,不谋求大规模的作战。10月下旬,武汉和广州沦陷,中日相持。10月28日,日本五相会议的决策显得格外醒目,他们决定今后将“确保广大地域的治安,进行长期建设”。

1938年11月18日,日“大本营”陆军部及陆军省部共同制定《十三年秋季以后指导战争的基本方针》,这成为日后侵华日陆军政略、战略的基础。也在此月,日“大本营”陆军部制定了《陆军作战指导纲要》,其明确提出尽力消灭敌航空作战力量,航空部队要将主力配置在华中方面。1938年12月2日,日参谋总长载仁奉天皇命下达“大陆命第二百四十一号”,该令明确要求:“五、以中部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为主,指挥中部中国及北部中国航空进攻作战,特别是在压制、扰乱敌政略及战略中枢的同时,争取消灭敌航空势力,为此须同海军密切协作。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及第二十一军应以各自所有的航空部队,适当地进行正面航空作战。”作为实施计划,当日,“大本营”陆军部和海军部共同拟定《陆海军中央关于航空的协定》,其中要求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协同在全中国各要地进行战略、政略的航空作战,陆军航空部队负责华北、华中要地,海军航空队主要担任对华中、华南要地作战。从日军的划分看,四川属于“华中”。同日,其向侵华日军下达“大陆指第三百四十五号”,其以中方之战略、政略中枢、最高统帅、最高政治机关为打击目标。“战略的航空作战”出台。为此,日军在武汉建立W基地。

二、日军如入无人之境

1938年10月后,重庆成为战时首都,自然是日军的头号目标。1938年12月26日,日机便从W基地起飞,对重庆进行侦察、骚扰、轰炸,可重庆当局和民众对此熟视无睹,并未进行有效的防空、国防建设和人口疏散,疏于防备,隐患无穷。

为了达到战略目的,1939年4月28日,“大陆命第二百九十一号”下达,作为该命令的具体实施“指示”,“大本营”海军部、陆军部下达“大陆指第四百四十号”,日军制定作战计划亦即“陆海军中央协定”,其中,将日军作战区域明确分为中支、北支和南支三部,重庆属于中支。命令下达后,位于武汉的W基地之第十三、十四航空队连续两日大规模地轰炸重庆。由于5月2日天气不佳,行动推迟至3日。

1939年5月3日,日机45架,其中,第十三航空队21架,第十四航空队24架,将第一目标和第二目标定为重庆市街军事设施、重庆广阳坝飞机场、白市驿飞机场。飞行机队编为两个,第一队队长增田少佐,飞机18架;第二队队长入佐少佐,飞机27架。当日11时15分,机群出发,下午15时11分,空战开始,日方称“敌战斗机三十余架”。17分时,日军冲入重庆市区,轰炸军事设施;20分时,日机2架“自爆”;45分,日机撤走。在此期间,中日双方发生空战,日方被击落2架,战死15人,受伤10人。中方的损失则为:“飞机廿五架中弹者十架,全毁者三架,待查者二架。”中方飞行员死亡2人,受伤4人。而在此日轰炸过程中,日军消耗炸弹268枚、烧夷弹19133枚、彻甲弹39483枚、曳跟弹24383枚。可见,其轰炸之惨烈程度。

5月4日,经过维修,第十三与十四航空队再次派出27架飞机,其中,第十三航空队12架,第十四航空队15架,继续以重庆市街的军事设施为目标。下午16时35分,机群从W基地出发,20时36分,日机开始轰炸,40分,中方飞机4架发生空战,23时35分,日机群悉数返回W基地。中方派出战机4架迎击日军,可惜,势单力薄,难阻日军暴行。日军肆无忌惮地飞入重庆轰炸。据日方统计,此次轰炸日军消耗炸弹160枚、烧夷弹170枚、彻甲弹175枚、曳跟弹175枚、机铳弹20枚。重庆顿时陷入火海,一片狼藉,两日人员伤亡多达8209人,损毁房屋多达9991间,物质财产与人员伤亡惨重。水、电设施被炸,城市运行一度瘫痪。其影响至深至远。随后,重庆市区人口疏散、防护方才加强,情况一度改善。

为达到其战略目的,日军滥炸重庆,制造了此次惨案。揆诸原因,中方空军力量固然薄弱,可民众的国防意识薄弱恐怕难辞其咎。20世纪上半叶,人类航空武器快速进步,战争的立体性显而易见,这在中日战场较早体现。当1938年2月18日日军首次侵入重庆上空,19日汉口《大公报》便说:“证明中国绝对无后方,无安全地。”身处重庆的中央大学教授朱希祖似视而不见地认为“不信”且“若无其事然”。可见,牢固的防空意识尚未根深蒂固,日后也由于此,付出的代价亦大。当然,战时重庆人口急剧增加,城市规模扩大,人口疏散与防空难上加难,发人深省。

(作者单位:广州应用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

■ 熊 韫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早期对共产主义思想进行系统阐述的奠基之作,深刻构成了其共产主义思想最初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不仅批判性地分析了粗陋共产主义和政治共产主义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还深入剖析了私有财产制度下人类生活的异化本质。重温这部经典,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以下观点之中:共产主义意味着人本身的解放;共产主义意味着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共产主义意味着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

一、对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思潮的批判

(一)对粗陋共产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在深刻批判与自我反思的历程中,深刻剖析了共产主义在其初始构想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即被英国的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及英国的欧文等人所倡导的“空想社会主义”,这种形态下的共产主义往往以一种看似普遍的私有财产形式出现,实则是对私有财产关系的一种粗浅且片面的理解。马克思指出,这种空想社会主义试图通过“完全平等”的方式废除私有财产,但其本质却是对私有财产本质的误解与歪曲。这种所谓的共产主义并未真正触及私有财产的核心——它不仅仅是对外在物质财产的简单拥有,更是人自我异化的产物。真正的共产主义应当是一个积极扬弃自我异化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实现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然而,粗陋的共产主义却将私有财产狭隘地等同于物质财产的累积与分配,主张平均主义,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与精神追求。

(二)对政治共产主义的剖析

在深入研读《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于笔记本III中,继对粗陋共产主义的深刻批判之后,进一步探索并细化了共产主义的另一种形态,将其划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仍“还具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另一类则致力于“废除国家的”。鉴于这两类共产主义均触及政治领域的深刻变革,学术界通常将它们统归为“政治共产主义”。从内容深度上看,马克思认为政治共产主义相较于粗陋共产主义有了质的飞跃,“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不再局限于物质财富的简单累积,而是深入到人际关系层面,将私有财产视为“人的自我异化”的象征。然而,马克思也犀利地指出了其局限性,政治共产主义在思考私有财产时,未能充分认识到其在满足人类需求、推动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和历史必然性。政治共产主义在处理私有财产问题时,往往陷入非历史唯物主义的误区,要么过分依赖国家机器的力量来推动变革,要么幻想通过国家的彻底消失来解决问题。

二、私有财产下人的异化生活

在深入剖析并批判了粗陋共产主义与政治共产主义的局限性后,马克思深入揭示了私有财产制度下人的生存状态所经历的深刻异化,他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私有财产下人的异化生活。

一是这种异化的生活是手段和目的的颠倒。在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著作《何为真正生活》中,人的自我成长、实现与个性的丰盈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远超过了对金钱、即时快感或权力的单一追求。马克思认为,在私有财产制度下,无论是劳动者还是资本家,都陷入了手段与目的错位的困境。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非但没有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反而导致了人性的扭曲和生活的异化。

二是人的感受与需求被归结为对货币与金钱的占有。在私有财产制度下,人们行动的唯一驱动力是对物质财富的无限渴望,其他所有肉体上的享受与精神层面的追求,均被金钱的拥有感所掩盖与替代。个体在私有财产制度中,既无法通过对外界的直接感知来确认自我价值,也无法通过深层次的思维活动来实现自我肯定,最终陷入了一种“绝对的贫困”。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货币的力量,实质上是其持有者力量的外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的价值取向,乃至整个世界的秩序,都在金钱的影响下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塑。

三是这种财富的占有和需要造成了富人生活的精细化和工人生活的简单化。这种社会现象鲜明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它并非以满足人类真实需求为目的,而是将利润最大化视为至高无上的追求。因此,对金钱与货币的狂热追求,不仅排挤了人类多样化的需求与渴望,更导致了工人阶层需求的极度压缩与粗陋化。

三、马克思的早期共产主义思想

共产主义意味着人本身的解放。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并非简单地否定或摒弃私有财产,而是一种对其的积极超越与升华。这种超越,即“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它旨在通过人的行动,实现对人的本质、生命意义以及人类创造物的感性、全面的占有,也就意味着“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在这样的状态下,个体不再受异化劳动的奴役,不再被私有财产所束缚,而是能够自由地与周围世界建立起真正属于人的关系,既占有对象又肯定自我。人的劳动及其成果不再是异己的、对立的力量,而是成为人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认与实现。

共产主义意味着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共产主义对人性本质的把握是全面而深刻的,是人的本质向自身全面而纯粹的回归。共产主义并非局限于对物质财富的片面占有或单纯追求其使用价值,相反它站在人性的高度,重新定义了人与物的关系,强调将物的特性与人的需求及本性紧密相连,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依据人本真的需求与天性,实现对物的真正掌控与利用,使之完全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而私有财产的存在曾一度遮蔽了这一本质,共产主义则是对人性社会性的全面恢复,是人向自我、向真正人类社会即人的本质所在的深刻回归。

共产主义意味着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马克思认为,历史的整体进程不仅是共产主义理念在现实中的孕育与诞生,也是这一理念在思维领域内被逐步理解和认知的过程。他明确区分了共产主义在思想层面的探索与在现实世界中的实践运动,强调两者虽紧密相连,却不可混为一谈。马克思指出,随着工人阶级运动从理论走向实践,那些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逐渐消散,并非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理想,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些理想的现实路径——即通过深刻理解运动的历史条件,并依靠工人阶级自身的组织力量。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共产主义进行了深刻剖析,它揭示了共产主义并非遥不可及的理想国,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在摒弃私有制、消除异化劳动后自然演进的新社会形态。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片面至全面持续进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划分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强调高级阶段的实现必须以初级阶段为基础。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更为细致地划分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三个阶段——“初期阶段”“中期阶段”以及“最高阶段”,并补充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阶段”,这一划分更加细致地描绘了共产主义实现路径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深入解读《手稿》及其后续发展,我们深刻认识到,共产主义理论不仅是马克思学说的核心要义,也是指引我们前行的关键灯塔。在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时,我们应秉持坚定的理论自觉与自信:共产主义虽非一蹴而就,但胜利终将到来;其道路虽长,却非遥遥无期。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